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效应研究

——基于 2011—2021 年沪深 A 股上市公司的考察

花俊国¹, 苏一鸣¹, 崔宇²

1. 河南农业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46;

2. 河南科技大学 商学院, 河南 洛阳 471000

摘要:在数字经济迅猛发展和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持续推进背景下,为探讨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效应,选取 2011—2021 年沪深 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及其机理。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对内部控制质量具有显著促进作用;高管团队特质具有一定的调节效应;数字化转型在非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中对内部控制水平的提升效果更显著。应从持续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注重优化高管团队素质结构、注重数字经济发展政策均衡性等方面,促进企业内部控制质量提升。

关键词:数字化转型;企业内部控制;高管特征;产权异质性

中图分类号:F234.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186/2025.04.009

文章编号:2096-9864(2025)04-0066-08

数字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必然驱动中国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战略,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数字经济是以数字技术平台为驱动、大数据为支撑、网络协同为基础的新经济系统^[1],也是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因素。《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报告(2022)》显示:2013—2021 年中国数字经济指数的年复合增长率达到 24.06%,远高于同期 GDP 增速,这表明数字经济已成为助力中国经济腾飞的重要动能之一。数字化转型是以数据为核心驱动力,通过重构组织架构、业务流程和运行机制,实现智能化升级的全过程^[2]。当然,经济效益的提高也

离不开企业内部控制水平的有力保障。

目前,在数字技术对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方面,已有学者进行研究并提出,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内部控制质量^[3];数字技术促使企业完善内部控制环境,创新企业内控提升路径,提高信息交互效率和内部控制执行效率,从而提高企业内部控制质量^[4]。另外,也有学者研究发现,高管特质能显著改善企业创新水平,进一步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5]。

总体来看,以往研究大多关注数字经济的内涵特征及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机制、内部控制水平的影响因素和经济效应等方面,而针

收稿日期:2024-11-22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2373036);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20YJA790027)

作者简介:花俊国(1963—),男,河南省新郑市人,河南农业大学教授,博导,主要研究方向:管理会计、公司治理;苏一鸣(2000—),女,河南省郑州市人,河南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管理会计。

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内控质量的研究相对较少。鉴于此,本文拟基于数字经济全球化的背景探讨微观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为经济管理部门差异化、精准化制定提升企业内部控制质量政策提供可靠实证依据。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

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并确保控制活动的科学性。企业利用数字技术可发现管理的漏洞,消除组织结构的冗余层级,保障企业组织层次的清晰明朗,推动企业内部信息沟通与交流^[6];在控制活动方面,数字化转型可通过分析信息数据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7]。企业利用数字化技术可构建智能化的流程审批程序,制定严格的标准,科学分析审批项目,提高审批效率。这些变革都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确保企业科学、规范地实施控制活动,从而保证企业内部控制质量。

数字化转型能提升企业风险评估的效果并广泛覆盖监督环节。加快数字信息技术在内部控制体系中的应用,可提升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效能^[8]。智能化技术可帮助企业精准识别内部风险,制定有效恰当的应对措施;在监督环节,数字化转型可加强各部门的牵制与监督,扩大内部监控的覆盖范围^[9]。企业利用数字化技术准确分析监督结果,可提高信息处理速度,确保及时诊断并修复监督缺陷等。由此可见,数字化转型能够有效提高风险评估效果,在企业内部实施全覆盖式监督,进而提升内部控制质量。

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信息沟通交流的效率,可有效提升企业的数据分析与整合能力,降低沟通成本,改变信息不对称现象,为企业决策提供高质量信息^[10]。数字技术消除了传统信息传递的冗余环节,企业通过建立信息数据共享平台,加强了与利益各方的联系,促进企业内

外部信息的沟通与交流,从而提升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内部控制质量提升具有促进效应。

2. 高管特征在数字化转型与内部控制质量之间的调节作用

高管团队作为企业的利益相关者之一,在企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方面,高管素质能力能够促进企业的健康成长和持续发展,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因素;另一方面,在管理者能力相同的情况下,高管的不同特征会影响其决策制定与对管理活动的重视程度,从而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和内部控制体系的完善。

目前有诸多研究探讨了高管特质对企业绩效的影响。D. Hambrick 等^[11]基于高层梯队理论研究发现高管的个人特质会影响企业战略选择。焉昕雯等^[12]提出管理者能力越强,对自身和企业的发展就越自信,并且适度的自信有利于规避风险,提高公司的价值。高管团队的不同特征,会影响公司决策的制定。一方面,金融市场具有资本流动性大、信息变化快等特征,导致具有金融背景的高管团队对企业活动的风险把控程度较高,不仅能够全方位地考虑企业所面临的挑战,同时还可以运用专业知识和自身经验进行决策,保障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海外任职背景与海外求学经历通常会使高管具备优秀的实践经验和专业素养,并且具有更高的风险容忍度和勇于冒险的心态,在创新方面具有较大优势^[13],更容易接受并应用数字技术,优化内部控制系统,从而改善企业总体控制水平。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 高管海外背景特征在数字化转型与内部控制质量之间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H3 高管金融背景特征在数字化转型与内部控制质量之间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二、研究设计

1. 数据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 2011—2021 年沪深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结合以往研究对数据进行以下筛选:(1)剔除 PT、ST、*ST 公司样本;(2)剔除金融和保险类公司样本;(3)剔除既在 A 股上市又在 B 股上市的公司样本;(4)剔除存在数据缺失的公司样本。公司财务指标与治理数据均来自 WIND、CSMAR 数据库,公司年报均来自于沪深证券交易所官网,并对样本数据进行上下 1% 的缩尾处理,最终得到 22 315 个样本。

2. 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内部控制质量(IC)。采用深圳迪博数据研究所公布的内部控制指数除以 100 后作为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数据处理后取值分布在 0~1,以缩短各个变量指标之间的量级,方便后续的实证结果验证。

(2)解释变量:企业数字化转型(Digital_text)。根据对已有的文献整理后发现,之前大多数文献仅从理论分析和定性角度来衡量数字化转型指标^[7,14-15],少部分文献从定量、实证研究的角度研究数字化转型^[16]。基于以上考量,本文参考吴非等^[17]的做法,通过下载并整理上市公司年报数据,将与数字化有关的关键词统计分类细化后,对该指标结果加总后取自然对数来反映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程度。

(3)控制变量:参考张钦成等^[16]的做法,对内部控制指数进行深入研究并横向对比后选择一些可能会造成实证分析结果偏误的变量加以控制,具体指标变量说明见表 1。

3. 模型设计

本文借鉴邵保萍^[18]和白玺艳等^[7]的相关做法,为验证 H1 设定如下模型:

$$IC = \alpha_0 + \alpha_1 Digital_text + \sum Control + \sum Year + \sum Industry + \epsilon it \quad ①$$

其中,Digital_text 为解释变量即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被解释变量 IC 为内部控制质量,Control 为系列控制变量。同时,模型还设置了年份效应 Year 和行业效应 Industry,分别用于控制不随时间变化的时间因素和行业因素, ϵit 为误差项。

为验证本文 H2 和 H3 是否成立,在模型 ① 的基础上加入高管特征交互项并构建如下模型:

$$IC = \beta_0 + \alpha_2 Digital_text + \alpha_3 Oversea_Ratio + \alpha_4 Digital_text \times Oversea_Ratio + \sum Control + \sum Year + \sum Industry + \epsilon it \quad ②$$

$$IC = \mu_0 + \gamma_1 Digital_text + \gamma_2 Finback_Ratio + \gamma_3 Digital_text \times Finback_Ratio + \sum Control + \sum Year + \sum Industry + \epsilon it \quad ③$$

如果模型 ② 中 Digital_text $\times$ Oversea_Ratio 的系数 α_4 显著为正,模型 ① 中 Digital_text 与 IC 显著为正,那么 H2 得到验证;如果模型 ③ 中 Digital_text $\times$ Finback_Ratio 的系数 γ_3 显著为正,模型 ① 中 Digital_text 与 IC 显著为正,那么 H3 得到验证。

三、实证结果分析

1. 描述性统计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见表 2。内部控制质量平均值和标准差分别为 6.284 0 和 1.529 0,绝大部分的企业内控评分都大于 0,表明样本中的企业内部控制质量整体较好,但也存在内部控制无效的企业,这可能是由于企业的管理层不重视,或是迪博公司提供的数据并未涵盖所有企业所导致的。数字化转型的平均值和标准差分别为 2.695 0 和 1.194 0,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是 5.661 0 和 0,这说明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进程存在明显差异,且不同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程度差异较大。其余数据情况与现有

表1 指标变量说明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取值
被解释变量	内部控制质量	<i>IC</i>	迪博内部控制指数/100
解释变量	企业数字化转型	<i>Digital_text</i>	年报数字化转型词频统计+1后取对数
控制变量	公司规模	<i>Size</i>	总资产加1取对数
	资产负债率	<i>Lev</i>	资产负债率
	上市年限	<i>Age</i>	上市年限加1取对数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i>Top1</i>	企业第一大股东持股数量/企业发行的普通股的总股数×100%
	净资产收益率	<i>Roa</i>	净利润与总资产的比值
	独立董事比例	<i>Indpdrtrt</i>	独立董事比例(%)
	审计师是否来自“四大”	<i>Bigfour</i>	是取“1”,否取“0”
	审计意见	<i>Opinion</i>	标准意见取“1”,否取“0”
	产权性质	<i>Soe</i>	国企取“1”,非国企取“0”
	年份	<i>Year</i>	时间效应
调节变量	行业	<i>Industry</i>	行业效应
	海外背景	<i>Oversea_Ratio</i>	具有海外背景高管/高管总人数
	金融背景	<i>Finback_Ratio</i>	具有金融背景高管/高管总人数

表2 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i>N</i>	<i>mean</i>	<i>sd</i>	min	max	<i>p50</i>
<i>IC</i>	22 315	6.284 0	1.529 0	0	8.322 0	6.639 0
<i>Digital_text</i>	22 315	2.695 0	1.194 0	0	5.661 0	2.708 0
<i>Size</i>	22 315	22.250 0	1.319 0	19.660 0	26.280 0	22.070 0
<i>Lev</i>	22 315	0.387 0	0.215 0	0.012 4	0.900 0	0.372 0
<i>Top1</i>	22 315	0.351 0	0.146 0	0.099 7	0.748 0	0.329 0
<i>Age</i>	22 315	2.221 0	0.775 0	0.693 0	3.332 0	2.398 0
<i>Roa</i>	22 315	0.042 4	0.061 7	-0.193 0	0.248 0	0.036 4
<i>Indpdrtrt</i>	22 315	38.900 0	10.170 0	0	66.670 0	37.500 0
<i>Bigfour</i>	22 315	0.087 7	0.283 0	0	1	0
<i>Opinion</i>	22 315	0.970 0	0.171 0	0	1	1
<i>Soe</i>	22 315	0.576 0	0.494 0	0	1	1
<i>Oversea_Ratio</i>	17 959	0.193 0	0.271 0	0	1	0.125 0
<i>Finback_Ratio</i>	17 959	0.240 0	0.325 0	0	1	0.167 0

研究基本一致,这也表明了数据的真实性。

2. 回归分析

回归结果见表3。表3中列(3)显示:控制年份和行业后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内部控制质量的系数为0.460,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内部控制质量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企业通过建立以数字技术为依托的完善的企业内部控制体系,可改善企业的内部环境和组织结构,同时提高信息沟通交流的效率和有效性,以及企业的智能化水平,进而达到提升内部控制质量的效果。基于高管的海外背

景和金融背景方面来研究其在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内部控制之间的调节效应,表3中列(4)和列(5)数据显示:*Digital_text*×*Oversea_Ratio*的系数为0.320,在1%水平上显著;*Digital_text*×*Finback_Ratio*系数为0.480,在1%水平上显著。这说明高管特征在数字化转型与内部控制之间具有正向调节效应,高管成员的海外背景和金融背景会对其决策倾向和风险承受能力产生影响。当高管团队中具有国际视野和金融专业知识成员的比例增大时,整个团队的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得到显著提升。这不仅可增强企

表 3 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IC				
	(1)	(2)	(3)	(4)	(5)
Digital_text	0.105 *** (12.29)	0.390 ** (5.71)	0.460 ** (6.33)	0.500 *** (5.19)	0.650 *** (5.66)
Oversea_Ratio				-0.002 (-0.05)	
Digital_text × Oversea_Ratio				0.320 *** (3.17)	
Finback_Ratio					0.129 ** (1.66)
Digital_text × Finback_Ratio					0.480 *** (2.68)
Size		0.093 *** (11.73)	0.121 *** (11.53)	0.097 *** (8.46)	0.098 *** (8.52)
Lev		-0.375 *** (-8.80)	-0.470 *** (-8.11)	-0.392 *** (-6.33)	-0.393 *** (-6.34)
Top1		-0.201 *** (-3.53)	-0.160 *** (-2.84)	-0.237 *** (-3.80)	-0.247 *** (-3.95)
Age		-0.340 *** (-29.29)	-0.328 *** (-25.10)	-0.319 *** (-22.37)	-0.319 *** (-22.38)
Roa		3.139 *** (22.30)	3.041 *** (14.91)	3.061 *** (13.42)	3.064 *** (13.42)
Bigfour		0.448 *** (14.63)	0.421 *** (16.23)	0.005 *** (6.05)	0.005 *** (6.04)
Opinion		2.488 *** (52.03)	2.443 *** (24.50)	0.474 *** (15.88)	0.478 *** (15.95)
Soe		1.271 *** (74.44)	1.256 *** (65.14)	2.462 *** (22.43)	2.455 *** (22.33)
Constant	6.001 *** (238.21)	1.757 *** (11.07)	1.209 *** (4.84)	1.272 *** (58.30)	1.270 *** (58.44)
Year&Industry FE	NO	NO	YES	YES	YES
R ²	0.07	0.413	0.428	0.440	0.445

注：***、**、* 分别代表 1%、5%、10% 的显著性水平；括号中是经过聚类稳健标准误差调整的 *t* 值；表中数据表示标准化系数。下同。

业对新技术的采纳意愿,加快其数字化转型步伐,还有助于优化内部控制系统,进而提高企业整体的内部控制效能。

3. 稳健性分析和内生性分析

为了避免因数据问题而导致模型结果不稳健的情况发生,本文采用替换变量和滞后一期的方法检验模型的稳健性。另外,模型可能存在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如某些遗漏变量会同时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内部控制质量,或忽略了内控水平高的企业可能会主动推进数字化转型,对此本文尝试构建工具变量来缓解这一

问题。

(1) 替换变量:借鉴吴非等^[17]和赵宸宇等^[19]的做法,采用文本分析法来对模型变量进行替代性检验,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指数对数(ICI),将解释变量替换为年报数字化转型词频占年报总词频比例(*Digital_text2*)。表 4 所示替换变量的滞后回归结果显示,H1 具有稳健性。

(2) 自变量滞后一期:为消除时间因素的影响,将企业数字化转型滞后一期后对模型①继续进行检验,在表 4 列(4)中,滞后一期的数

表4 稳健性分析结果

变量	ICI (1)	IC (2)	ICI (3)	IC (4)
Digital_text	0.120*** (0.001)			0.590** (0.011)
Digital_text2		0.703*** (0.133)	0.600*** (0.017)	
Control	YES	YES	YES	YES
Year&Industry FE	YES	YES	YES	YES
Constant	2.693*** (0.036)	-1.652*** (0.279)	2.661*** (0.035)	-1.859*** (0.318)
Observations	22 315	22 315	22 315	22 315
R ²	0.293	0.287	0.291	0.273

数字化转型数据系数在5%水平上仍然显著,表明前文实证结果稳健。

(3)工具变量: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来缓解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参考黄群慧等^[20]构建工具变量的思路,选择上市公司所在城市的互联网普及率(*Internet_Rate*)、科学技术指数水平(*Science*)、移动电话数量(*Mobile*)作为工具变量,选取指标变量均满足相关性原则和排他性原则(见表5)。由表5可知,第一阶段数据结果拒绝了弱工具变量的假设,第二阶段数据表明在控制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成立。

表5 内生性检验结果

变量	Digital_text first stage (1)	IC second stage (2)	Digital_text first stage (3)	IC second stage (4)	Digital_text first stage (5)	IC second stage (6)
Internet_Rate	0.344*** (0.058)					
Digital_text		0.402*** (0.325)		0.748*** (0.129)		0.535*** (0.155)
Science			0.19*** (0.002)			
Mobile					0.48*** (0.005)	
Constant	-3.435*** (0.159)	2.951*** (1.129)	-3.453*** (0.158)	0.762 (0.496)	-3.529*** (0.159)	0.051 (0.569)
Observations	22 315	22 315	22 315	22 315	22 315	22 315
R ²	0.402	0.337	0.405	0.116	0.403	0.206
Control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Industry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四、异质性检验

1. 产权异质性

考虑企业的所有权性质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效应,本文按照产权性质分组检验^[21],结果显示:国有企业*Digital_text*系数为0.18,在10%的水平上显著,非国有企业*Digital_text*系数为0.91,在1%的水平上显著。二者的组间系数为0.018 2,差异显著(见表6)。这表明:相比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对内部控制质量的提升作用更大。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国企规模大,信息沟通效率低,在市场经济中占支配地位使其缺乏发展动力,不愿意为了潜在的收益而放弃目前公司稳定的状态;而非国有企业在市场中存在一定的生存压力与风险,管理者愿意尝试新技术,更新企业的流程路径,提升内部控制质量,以期获得更高的收益来稳固在市场中的地位。

2. 规模异质性

由表6可知,大规模企业*Digital_text*系数为0.80,在1%的水平上显著;小规模企业*Digital_text*的系数为0.45,在5%的水平上显著。

表 6 不同特征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量	产权		规模		地区	
	国有 (1)	非国有 (2)	大规模 (3)	小规模 (4)	东部 (5)	中西部 (6)
Digital_text	0.18 * (4.52)	0.91 *** (5.11)	0.80 *** (6.39)	0.45 ** (3.97)	0.40 ** (4.93)	0.19 (0.82)
Constant	5.016 *** (39.95)	1.122 ** (2.09)	3.391 *** (15.73)	3.988 *** (18.80)	-0.465 *** (1.46)	-3.168 ** (-6.41)
Control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Industry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Observations	12,850	9,464	11,979	10,335	15,017	7292
R ²	0.341	0.315	0.431	0.419	0.243	0.285
组间系数差异	0.018 2 **		0.039 8 **		0.032 1 **	

二者的组间系数为 0.039 8,差异显著。这表明数字化转型在大规模企业中对内部控制质量的驱动作用更明显,其原因可能是:大规模企业在业务能力和经营业绩方面会优于小规模企业,不存在较大的竞争压力,有更多的资金和意愿利用新技术优化更新企业的发展路径;而小规模企业迫于生存的压力,一般会更注重争夺市场份额,对于新技术新理论不会自主地接受,因而数字化转型对内控质量的提升作用有限。

3. 地区异质性

区域经济的发展水平同样也会对企业的发展产生影响效应。由表 6 可知,东部地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系数为 0.40,在 5% 的水平上显著。中西部地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系数为 0.19,并不显著。二者的组间系数为 0.032 1,差异显著。这表明:东部地区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内部控制质量的提升作用相较于中西部地区更明显。原因可能是:完善的资本市场结构、政策的着重倾斜和便利的基础设施,都为东部地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有利条件;而中西部地区企业由于技术资金不到位和市场经济不发达等原因,造成了其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东部地区企业存在差异。可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导致了不同地区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参差不齐。

五、结论与建议

在数字经济迅猛发展和企业数字化转型进

程提速的大背景下,本文基于 2011—2021 年沪深 A 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内部控制之间的关系,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内部控制质量具有提升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高管团队的海外背景和金融背景在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内部控制质量之间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非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基于上述研究结果,就如何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我们提出如下具体建议。

其一,持续推动数字化转型,构建基于数字技术的内部控制体系。企业可利用数字技术打造完全市场体系,打破信息沟通难、效率低的壁垒,提高信息交流效率,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商品的快速流转,推动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推动企业治理结构、经营业务和权责制度的分配更加智能化,提高企业的数字化水平。

其二,充分考虑企业的异质性,差异化制定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政策。由于企业在规模、地区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政策制定需要兼顾均衡性与针对性,确保不同企业能够平等接触和利用数字技术资源,保障数字技术的可及性与公平性;同时制定专项政府补贴政策,引导企业将内部控制与业务经营、组织管理机制深度融合,缩短数字技术成果的转化周期,加速推进不同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进程。

其三,建立高层次人才引育机制,优化企业高管团队素质结构。政府、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应相互支持、通力配合,共同探索数字化人才培养的多元化渠道。在此基础上,企业应大力引进高质量人才,借助高校的相关课程和教师资源,积极开展人才培育活动,让员工能更好地接受和利用数字技术,为提高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积蓄人才力量。

参考文献:

- [1] 罗鹏,王婧,陈义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机制研究[J].企业经济,2023,42(9):25-37.
- [2] 黄宏斌,梁慧丽,许晨辉.数字化转型驱动了企业协同创新吗?[J].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23,43(11):96-113.
- [3] 王福君,吴浩.数字化转型、内部控制与企业高质量发展[J].会计之友,2023(24):100-106.
- [4] 张国康.论企业内部控制数字化建设[J].会计之友,2005(8):17-18.
- [5] 全冬梅,邱文琦,田乐瑶.数字化转型、高管掌控力与绿色创新[J].财会通讯,2024(2):47-51.
- [6] 周竹梅,郑清兰,孙晓妍.内部控制有效性与研发投入强度相关性研究:基于企业社会责任的中介效应检验[J].会计之友,2019(16):41-46.
- [7] 白玺艳,吕婵.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市场价值的影响:基于内部控制质量的调节效应[J].中国注册会计师,2023(2):63-68.
- [8] 梁国栋,黄颖,夏岳红.国有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数字化转型的框架与关键举措[J].财会通讯,2023(16):15-21,66.
- [9] 张羽佳,林红珍.基于数字化赋能的企业内部控制研究:来自华为1987—2022年的经验证据[J].财会通讯,2022(22):142-148.
- [10] 段华友,黄学彬.数字化转型、内部控制质量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以资源型企业为例[J].工程管理科技前沿,2022,41(6):65-72.
- [11] HAMBRICK D, MASON P. Upper echelons theory: The organization as a reflection of its top managers[J].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84, 9(2): 193-206.
- [12] 焉昕雯,孔爱国.管理者能力对企业价值的提升效应:基于市场竞争与地方保护的视角[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63(1):172-183.
- [13] 魏彦杰,尹飞,钟娟.高管海外背景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来自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现代管理科学,2022(6):75-85.
- [14] 黄益平,黄卓.中国的数字金融发展现在与未来[J].经济学(季刊),2018,17(4):1489-1502.
- [15] 陈冬梅,王俐珍,陈安霓.数字化与战略管理理论:回顾、挑战与展望[J].管理世界,2020,36(5):20,220-236.
- [16] 张钦成,杨明增.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内部控制质量:基于“两化融合”贯标试点的准自然实验[J].审计研究,2022(6):117-128.
- [17] 吴非,胡慧芷,林慧妍,等.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资本市场表现:来自股票流动性的经验证据[J].管理世界,2021,37(7):130-144,10.
- [18] 邵保萍.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内部控制有效性[J].会计之友,2023(4):127-133.
- [19] 赵宸宇,王文春,李雪松.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J].财贸经济,2021,42(7):114-129.
- [20] 黄群慧,余泳泽,张松林.互联网发展与制造业生产率提升:内在机制与中国经验[J].中国工业经济,2019(8):5-23.
- [21] 刘畅,周羽嘉,花俊国.高管与员工薪酬差距、管理者能力和内部控制质量: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J].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3(3):67-74.

[责任编辑:毛丽娜 张省]



引用格式:花俊国,苏一鸣,崔宇.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效应研究:基于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考察[J].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26(4):66-73.